

·新作 推介

听见历史的回响

——读冉正万中篇新作《黔灵山》

陈羽茜 文 / 图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血泪交织，中华民族曾经历革命洗礼、民族独立、文化复归等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时刻。对于这段历史，无数史学家、文学家都曾不舍昼夜地予以探寻。贵州著名作家冉正万发表于《芳草》上的中篇新作《黔灵山》正是以此为时代背景，对历史褶皱深处的抗战事迹进行的一次个性化书写。

小说以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去世一事开篇，引出竺可桢校长前往贵阳安排后事、师生追忆悼念、众人为梅光迪挑选墓地，在黔灵山里埋骨安葬等一系列事件。作者深谙时间和空间是进入历史的最佳切入点，在小说架构上做了相应探索。时间上，小说以安排梅光迪先生后事为主线，穿插了抗战叙事，看似漫不经心宕开一笔，实则通过精心编排铺开浩荡历史，亦为梅光迪先生离世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沉痛气息。空间上，“七七事变”爆发后，《四库全书》的藏匿地点多次易址，浙江大学历经波折从杭州辗转至遵义，作家的笔触也随之记录下各地人文和抗战时期的民生风貌，刻度精确又气象恢宏。

《黔灵山》延续了冉正万以往的写作特点，将目光聚焦自己热爱

的故土。关刀岩、黔灵山、伏钵峰、马鞍山、六冲关……他熟稔这座城市的每一处景观、每一道纹理，并将之放置在历史大框架下加以渲染，使我们得以窥见贵州历经沧桑后依旧摇曳多姿的独特魅力。在“埋骨黔灵山”一章中，李今英感人至深的祭文《哭迪生》和竺可桢、王弼吾、黄尊生及浙大学生的送别仪式，让这段历史成为贵州的精神记忆和文化标识，赋予城市更丰厚的人文意蕴与历史气息。而黔地这处位于中国西南角的小城，也在作者的苦心耕耘下，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阿来的嘉绒藏区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般，成为冉正万文学版图的“精神地标”。

历史总是伴随着回忆，却也往往具有巨大的吞噬力，它会大而化之地隐去一些凡人琐事。冉正万以词句牵引、以精神架构，将过往鲜活生动的一幕幕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还是行程中遇到的贩夫走卒，甚至途中遭遇的匪首，都是历史这块版图中不容忽视的一块。作家将目光投向不同个体，用针脚精密、意味深长的文字平等观照战争背景下的每个人，让许多在历史洪流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人拥有鲜活

的话语、灵动的思想，让历史在大洪流与小生命的交汇融合中绽放出人伦之光。在小说中，我们不难读到掩藏在战争背后的民众不屈的筋骨与气血——迁徙途中，留在向塘乡间的师生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一位民俗学教授甚至苦中作乐，给同学们用嘴炒菜“打牙祭”；艰难的行程中，步行团的其中一队还“沿途采访各县商业、农业、教育等情况，为相应专业提供数据”，在危急时刻也未停下求知的步伐；颠沛流离中，刊登学生文章和时事新闻的《浙大日报》从未中断……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作家的关注点不只在揭示、抱怨历史对‘生活’的摧毁，不只是讲述生活‘不能’的‘悲剧’，也讲述‘可能’，探索那种有意义的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得以延续”。冉正万对历史的书写不仅铭刻着对祖国地标与城市的怀念，承载了艰苦岁月里国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是我们“节节失败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

历史的脚步早已远去，可记忆仍然鲜活如昨。在冉正万笔下，梅光迪“不在棺材里，他在你能看到的所有美好中，这美好散发着痛苦无法抹灭的智慧和柔情”；《四库全书》的多番辗转与迁能折射出国



期刊《芳草》封面。

人对文化瑰宝的珍视与坚守。在他笔下，这段掩上了尘埃的历史并未因重构而削弱其固有的价值，反而因小说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切的师生同事情谊、独特的地域文化跳跃着生命的律动。在他笔下，生存与死亡、宏大和渺小、高贵与卑下相互交织、相互成就，绘成一幅壮丽的抗战图景，生发出历史的铮铮回响。

《大国县治》：

揭示县域治理的运作逻辑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县级政权是一级完备政权，每一项政策自上而下都要经由县级才能落地。有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大陆有2000多个县。不同地区情况不同，每一个县都有独特县情；而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看，我国县域治理是成功和有效的。那么，县域治理是如何运作的？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教授的新作《大国县治》一书作了详尽的揭示。

杨华教授常年扎根基层，每年有不低于三个月的县乡调研。其调研是开放的，对县乡治理的经验积累较为总体和全面，囊括了人事、财政、权力、事务、政策、体制、机制、组织、机构等内容。此前出版的《县乡中国》一书，集中讨论的是政策在县域制定、转化、落地的场景及其机理；《大国县治》更多的则是呈现县域治理体制内部运行的实态，剖析其机制和逻辑，该书可以说是一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著作，作者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细致的基层观察、认真的学术思考，以县域政治运作逻辑与实

践为切入点，探讨了县域治理的诸多问题，其中既有高层建筑的宏观理论构建，又有解剖麻雀式的微观问题分析。

在书中，作者首先揭示了县域治理的体制架构，一是行政科层体制。县域治理的主体既有政府，也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其中政府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事务，因此，县级政府部门是县域治理最主要的主体，是按照科层制的基本原则设立的，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不同的专业分工，部门内部也有不同的职能科室，不同部门及科室有履行职能的法定职权及相关的财物配备，具备科层制的法定主义、技术主义、去人性化、事本主义等特点和优势，可以完成大部分日常性、分工明确的治理事务。但行政科层体制也有其弱点和缺陷，如只在乎行使职权的过程是否合法，而不在于行政效果，更不追求在短时间里治理面貌的改变，对职权行使之后的社会变化不敏感；不同部门的职能和利益是相互独立或相互竞争的，难以形成跨部门协作，无法满足复杂多变的治理事务对协同治理提出的功能需求，不

能在协同治理中形成治理面貌的整体改变……为此，县域治理设置了较行政科层体制有更高权威的党政体制。党政体制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其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的全面领导。

“党政体制与科层体制是相互区别的。科层体制是以条线为主依法进行专业事务治理，以实现专门领域的局部量变；党政体制则是通过党的组织系统的政治动员整合部门资源进行整体性治理，以实现总体性、结构性质变。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和相互转化。”书中写道，在县域治理实际中，党政体制将行政科层体制无法完成的治理事项承担下来，是中国县域治理的优势和特色。

在此背景下，作者解读了县域治理中的常见现象。比如，县乡“责权利”不匹配为何发生？如何避免好政策“一地鸡毛”？基层工作如何考核？如何激励基层干部？基层干部如何实现晋升与流动？诸多问题中，县乡“责权利”不匹配现象较为突出。书中分析了该现象的产生，是“属地管理”原则、“一盘



棋”思想、“政治任务”等要求下的“一刀切”“形式主义”问题。而尽量避免“一刀切”“形式主义”是解决县乡“责权利”不匹配问题的良方。

县域治理体制极其庞杂，要知其然已相当困难，更何况知其所以然。调查研究就是要掀开覆盖在事物表面的面纱，让日常展示其背后的道理，以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本书聚焦县域治理体制机制运行，并探索、揭示、总结了它的一般规律。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

·新作 述评

《铁锈新鲜》：

铁锈味道与东北文学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 / 图

《铁锈新鲜》是小说家阿郎的第二部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作者创作的八部中篇，书名颇能代表整本书的气质：铁锈意味着时间与年代的作用，其粗粝与强烈在抵抗着遗忘；而新鲜则标志着冷冽与疼痛，是记忆复活所制造的扑面而来的呼吸感。

以这本书为标志，阿郎的故乡写作展开了一幅更大的画卷。《铁锈新鲜》依旧有富拉尔基、安城这两个熟悉的地名，依然有耿队（刑侦队长）与我（民警身份的讲述者）两个常态人物。虽然书中故事偶有标注，但在阅读感受上，人物与情节是超越了时间与地域限制的，那些在新世纪前后沉浮的人与事，像是发生在当下。同样，那些眼前就能耳闻目睹的，也仿佛坠入二十多年前的时间里，这或正是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依赖时代赋予的符号与元素叙事，又往往能击穿时代，看到多年不变、忠诚的甚至是顽固的生活与思维模式。

八部中篇中，与书名同名的《铁锈新鲜》，从一个车外弹烟灰的细节，让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暴露出惊人的真相；《风雪夜归》分别以一个少年与民警的视角，刻画了一位中年女性美好与复杂的一面；《疼痛的秘密》说的是父亲的秘密。儿子按照父亲的请求，去寻找一个神秘的女人，揭开了一段贯穿大段人生的纯真恋情；《西边有座山》中的小黄楼是个隐喻，进进出出，都是人情与权力的纠葛；《夜宴》写出了婚姻尖锐破碎的一面，以此映照圈子与社会五棱镜一般的怪诞陆离。

这些故事之间，因为有同一城市、同一人物姓名的反复出现建立了内在联系，不同故事互为表里，也互为前后。阿郎在《铁锈新鲜》的写作中，更注重整体的呈现，在文字表层贡献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在语言的暗指和情节的交织下，让冰山逐渐上浮。只有阅读到《铁锈新鲜》属于冰山底部的表达，才能够觉察到东北文学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铁锈新鲜》足以消化读者对东

北叙事的期待”，这句有关东北文学定义的推荐语，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铁锈新鲜》的确有着东北文学标志性的硬冷、残酷的一面，这让小说集具有一目了然的标识度；另一方面，《铁锈新鲜》开始“消解”东北叙事的主要特点，比如减少了对东北方言的依赖，去除了大量具有感染力的东北话，使得留存的方言得以更简洁无痕地融入叙事中。这本书还削弱了幽默感，书中让人发笑的地方很少，但让人沉思的地方变多；此外，有关暴力场面的描写也大幅减少，内心冲突的激烈，取代了外化的肢体冲突，但同样让人感到紧张。

在阿郎这部新作中，能感受到他写作上的张力在进一步延伸。《铁锈新鲜》中的紧绷与松弛是同步的，严肃认真与玩世不恭是并存的，幸福与绝望是同根生的，人物在激情与麻木之间是可以自由切换的……但悲凉却是这几个故事的统一底色，悲凉恰也与书名的寓意相通。在《漫长的季节》之后，读者与观众对东北叙事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愿《铁锈新鲜》这本书写东北的小说集，能给喜欢这一主题的读者带来一些新鲜感。



《大明风华》：

展现真实多样的明朝城市生活

《大明风华》是知名明史学者陈宝良先生的新作，该书有个副标题“明朝人的城市生活”，点明了作者所关注的三个关键词：明朝、城市、生活。

“城市”是一个空间概念。在中国，城市是一个多功能的“混合体”：是一方政治中心，有一整套管辖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机构；是军事重镇，有坚固的城防设施以及一定数量的驻军；是产生市民阶层的温床，大量脱离了土地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市民阶层的后备军。据文献记载，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城市已初具规模；及至战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万家之邑，万家之邑”，散布于各国；随着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城市也不断增加、扩展，城市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与军事职能依然存在，而经济职能发挥得更为充分，城市的商业气息也更趋浓厚。到了明代，城市更是得到长足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生活达到鼎盛，城市中四方财富齐聚，有昆玉、琼珠、滇金、越翠，有洋货、皮货、参药；娱乐行业齐备，有游船、酒肆、茶店，有戏园、青楼。正可谓舟车辐辏，万货所聚，高贾云屯，人山人海，挨挤不开，一派喧闹繁盛景象。

“明朝”无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全球史的角度看，明王朝十六帝、276年，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大致重合。至万历中期，利玛窦等西方耶稣会士东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导致新的思想迅速萌芽。到晚明时期，传统的程朱理学受到阳明心学、西方文化等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个人、群体乃至社会的思想空前活跃，原有的城市生活变革由此加深。简言之，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激活的消费主义，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追求个性自由。

按照王国维先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大明风华》梳理了明代戏曲小说里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从中可以一窥明代的面目。比如《玉堂春》中为爱情受尽苦难而又结局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蔑视神权、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无论是在繁华大城市中的梨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是那么津津乐道。这些似乎就是现代读者对明代城市生活的

感性认识。当然，这反映的不过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侧影。

在书中，作者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从衣食住行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明朝城市里达官显贵、贤士大夫和市民众生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个真实、多样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

在城市风尚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明代已深入人心，苏州因园林而闻名，杭州因西湖那天然的湖光山色而扬名。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且操持全国各地城市的流行风尚，以致凡服装式样新鲜、新奇，概称为“苏样”；人们见到其他稀奇鲜见的事物，也称为“苏意”。

在日常生活上，商人的城市生活最为惹眼。原本在传统社会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在明中期地位逐渐提高。明代的大商巨贾绝不仅仅是鲜衣怒马、一味贪图享乐，而是很有头脑，在巩固自己经济地位的同时，通过博取科第、结交文人墨客等各种手段提高社会声誉，光耀门楣。他们在醉饱之余，对精神享受也不乏追求，喜欢看戏曲，通俗小说时常放在案头，夹在行囊，把玩古董、收藏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有些甚至有较高的文艺修养。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



《插图中的猫》：

梳理“猫形象”，盘点“猫文化”

“猫具有孩子气的脸、好奇的眼神、柔软的皮毛，以及能适时与人类发展感情的能力，猫对人类有吸引力。”吴伟先生的《插图中的猫》一书梳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猫形象”，盘点了“猫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漫长的驯养史中，与生活最为亲近的动物莫过于猪、牛、羊、马、鸡、狗，即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六畜”。猫不在“六畜”之列。但猫和狗一样，成为人类在精神层面最重要的伴生动物。猫很早就成了人类的伙伴，通常认为，野猫出现于200万年前，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被古埃及人驯化为家猫。猫的驯化史也有不同的观点，如《离开荒野：狗猫牛马的驯养史》一书认为，世界上的家猫仅与中东的野猫共享基因模式，也就是说中东是家猫的摇篮。

历史上的古埃及人与古阿拉伯人都敬奉猫。《插图中的猫》一书介绍，埃及人奉猫为神兽：约公元前1638年，埃及开始出现关于猫的画面，受宠的猫偶尔会陪主人出去打猎。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350年）的一幅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展示了猫帮助主人捕鸟的情景；埃及第二十二王朝（公元前1150年）的一幅石灰岩陶片，描绘

了一只猫守护着六只鹅和一窝蛋，或可以理解为猫为鹅赶车。古埃及猫的青铜制品展现了猫的家庭属性；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盖尔—安德森猫雕像”，作为标志性的埃及雕塑，其知名度仅次于吉萨狮身人面像和图坦卡蒙的黄金石棺。事实上，古埃及神祇中的玛埃代特、塔努特、贝斯特、赛克美特、帕赫特等，皆与猫或狮有关。此外，阿拉伯人也敬奉猫，普遍认为神灵会附到猫身上在家中游荡，所以他们不杀猫。阿拉伯有这样的谚语：猫是狮子通过喷嚏创造的。

猫被人们宠爱，因此得以繁衍兴盛。作者认为，埃及家猫首先传至古希腊、古罗马；再自波斯、印度传播到远东，约公元初年传入中国，约7世纪、唐朝时，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古希腊的荷马、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都写到了家猫；家猫在我国被称为“狸奴”，“狸奴”在元代已经是常见词汇。猫传入日本后，长期被视为珍宝，只有天皇和贵族才有养猫的权利。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年），猫开始出现在日本的各类文献当中。在镰仓时代（1192—1333年），船上作为捕鼠能手的基本上是短尾猫。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由于鼠患严重，政府允许平民养猫，从此日

本猫从贵族圈走向了平民。猫作为吉祥物，后来还发展为“招财猫”，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猫通过猎食啮齿类动物来帮助人类，但猫的魅力不仅仅因其具有实用价值。猫凭借“孩子气的脸、好奇的眼神、柔软的皮毛”，成功融入了人类的生活，成为人类亲密的伙伴。即便如此，猫和狗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在驯化过程中仍基本保留了自己的外形和野性。也因此，猫的地位和猫文化的内涵，存在着地域文化的差异。作者写道，猫的眼睛在黑暗中会发光，走路没有声响，被认为是伪装的魔鬼或邪恶的化身，随时会给人带来灾难。波斯和印度两地的拜火教徒将猫视为邪恶的化身；欧洲中世纪，猫被人们视为恶魔般的存在，教会把猫和异教徒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迷信、恐惧和宗教迫害，猫遭到大规模屠杀。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猫的形象意义逐渐脱离了奇幻色彩，变得越来越正面。猫的形象不仅出现在建筑物中，也出现在欧洲的家族纹章中。此外，中西方文化均认为猫有贪婪、虚伪、懒惰的特点。例如“馋猫”“猫哭老鼠”“懒猫”“猫有九条命”等。这是中西方猫文化内涵的共性。

与此同时，《插图中的猫》还展示了50多位知名插画家和少数



无名氏创作的约350幅插图，图片大部分源自外文书，少部分来自中文书。这些插图展现了形态各异的猫，构成了生动形象的猫文化史；有写实的猫，有被风格化的猫，有穿着华服的猫，有穿着靴子的猫；有捕猎的猫、唱歌的猫、演奏乐器的猫、狡猾的猫、风骚的猫、高冷的猫。这些猫在插图中或为主角或为配角，构成了“猫间百态”。从中我们会发现，猫的世界其实也是人的世界。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